■战略管理

不同之中有大同

——谈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及其国际合作

□张英利

当前多种安全威胁的趋势与特点

国际安全形势的不断变化，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对国际安全形势的看法，感知能力不同，思维方式不同，采用的方法论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天灾与人祸并存，可知与不可知的风险同在，传统与非传统威胁相互交织，构成当前多种威胁的复杂特征。

从传统安全角度来看，总体稳定，局部战乱，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主题。正是由于总体稳定，所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经济才能得以发展。也正是由于围绕世界政治、经济、资源和地缘战略主导权的争夺进一步加剧，局部冲突此起彼伏，一些传统安全威胁的存在，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始终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

从非传统安全角度来看，总体动荡，局部稳定，日趋紧张。过去曾被忽视的问题正以不同的形式冲击着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安全。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殃及全球，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陡然下滑；粮食问题使数以亿计的人面临饥饿的威胁；恐怖主义继续以不同的方式威胁国际社会，并有向全球各个角落蔓延的趋势。世界上至少有1/3以上的国家进行过或正在进行反恐或与反恐有关的斗争。在没有国界的太空，合法跨越国界的网络，一种特殊的战争形态正在酝酿，一旦形成必将对全球安全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全球气候变暖和生态恶化引起自然灾害频发，对全人类所造成的危害影响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世界一些热点问题久拖不决，对地区安全的影响居高不下，不仅使传统的危机管理理论显得苍白，而且暴露出现行国际安全机制的格外脆弱。和冷战时期相比，现在的热点问题或者危机，持续周期越来越长，处理难度越来越大，成功解决的概率越来越低，所谓危机的临界点也荡然无存。要么只看到风险呈螺旋式上升而抓不住机遇，要么危机失控形成既成事实，并且为新的更大的危机埋下了隐患。一些危机使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被动或主动介入其中，从而引发新的地区安全问题，甚至形成全球性挑战。无法解决的危机，本身就是威胁，而且是更大的威胁。这一点，不能不说是多种威胁的又一重要体现，时刻在考验着各国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智慧。

多种安全威胁催生了军队多样化的使命

在当今世界的防务与安全领域，我们不难看到这样一种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维护和平、避免对抗、促进发展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推动军队的转型，改善军队的装备，提升本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即使是在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期，全球军费开支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幅提升，仅2009年的军费开支就比2007年增长了10.9%。这种现象背后，除印证了各国战略互信不足外，也说明了各国领导人已经敏锐意识到，应对多种安全威胁，有必要提升军队的核心军事能力，拓展军队多样化的使命。

首先，各个国家维护本国核心利益的意志不会轻意动摇，所以军队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基本使命不会改变。只有保证各个国家的自身安全，才能实现共同安全。应该承认，从以战争解决问题，到以发展军力保持力量的平衡来避免冲突，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尽管这种进步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其次，军队的职能在扩展。非传统安全威胁给人类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安全威胁造成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仅近10年来，全球发生的较大规模的恐怖事件就导致11.5万余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8000亿美元；而全球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造成至少70万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3万亿美元。在大规模战争已经很久没有光顾地球的时期，人们不由自主地把关注点放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有的西方国家提出，军队已经从本土防卫军向反恐与维和的远征军转变。在刚刚结束的亚洲安全会议上，一些国家的国防部长甚至提出，亚太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各国军队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救灾。尽管这样的观点看起来绝对，但也说明军队使命的日趋多样化，正在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

最后，军队完成多元化使命，并不排斥军队传统作战能力的提高，如战略投送能力、侦察预警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精确作战能力。这是因为，军队无论是遂行战争行动任务还是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这些能力都是必不可少的。

应对多元化威胁中的国际安全合作

全球化不仅使各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而且把各种威胁联系在一起。尤其是那些我们至今难以准确预测和防范，而又具有巨大摧毁能力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任何国家单靠自身的能力都难以应对。而各国国家利益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联系的普遍存在，本国利益与地区利益以及全球利益一致性的不时显现，又给各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带来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发展空间。这种合作至少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和平性。就是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自主自愿的原则下，遵循《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以维护或恢复和平与安定为目标，推进双边、多边和地区的军事合作。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已经理智地认识到，面对多元化的威胁，战争不会有最终的赢家，对抗最终会导致两败俱伤。各行其是，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世界的安宁，地区的稳定，他国的和平，已经构成本国安全的必要条件。因此，谋求合作将越来越多地成为各国在处理安全问题时的基本选项。例如，各国军队在国际维和、抢险救灾、实施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已经开始了成功的合作。各国高级军官和警官进行学术上的互动和理论上的分享，也是促进国际军事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互利性。就是坚持在双边或多边共同利益基础上，开展有利于各方的军事合作。当前，多种安全威胁侵害的主体往往是各国的平民甚至整个人类社会，从而使各国军队在许多方面有了相同的使命。应对共同安全威胁，产生各国共同的利益，国际军事合作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还有着日益增强的迫切性。这种合作往往能够跨越意识形态、跨越宗教信仰、跨越地理空间。它既可以在友好国家间出现，也可在存有矛盾的国家间进行。如许多国家军队联手打击跨国犯罪，在双边、多边或区域性组织的框架内开展联合反恐行动，各国海军在亚丁湾联合展开的反海盗行动，就是国际社会为保护海上交通线，维护各国共同利益，而采取的规模空前的一次军事合作。

三是选择性。就是旨在求同存异中扩大合作，在保持自主性的同时展现务实性和灵活性。针对特定的国家、特定的安全问题，有关国家的军事合作可以在时空上、层次上、领域和方式上进行选择，使得合作的各方在某些方面存在分歧时，不至于影响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合作。在传统安全合作的时机不成熟时，可以先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战略层面合作无法展开时，可先进行人员交流或技术层面的合作。这样，可以为各国军队联手应对多元化安全威胁创造更多的现实可能性与具体操作空间。例如，俄罗斯和挪威历时40年后，在地缘政治和海底资源都具有重要地位的巴伦支海成功地解决了海上争端问题，就是得益于两国政府和防务部门的选择性合作。他们首先从渔业生产秩序的共管入手，尔后建立两国的政治和军事互信，最后合作解决了涉及国家主权的海洋划界问题。

■新军事变革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关乎战争胜负

□蔡仁照

军事斗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巨系统，衡量军事系统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作战能力的强弱。高新技术发展对军事领域的影响十分广泛，最终都体现在作战能力上。世界近期局部战争表明，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关乎战场主动与战争胜负。适应新军事变革发展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不仅是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准备，也是推进国家信息化发展、提高综合国防实力的重要举措。

体系对抗是信息化战争的重要特征

军队信息化发展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新军事变革推进军队建设由机械化军队向信息化军队转型、推动局部战争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主要是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技术的主导和牵引。以往，受军事技术发展的局限，不同战场空间的作战力量独立作战，相互影响不大。工业化时代，飞机、大炮、坦克等单项武器在机械化战争中发挥的作战能力，在一定的战争领域产生战果。现代战争是由庞大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能量流构成的开放系统，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把产生军队战斗力的各个子系统、分系统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把各种复杂的作战要素、作战单元联结成一个紧密结合、协调运行的体系，这个体系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作战力量的效能，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整体效应。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已不是单个或数个作战力量单元之间的对抗，而是一个作战体系与另一个作战体系的对抗。信息系统提升体系作战能力，如果作战体系结构不合理，功能不齐全，单凭几件先进武器是形不成强大的作战能力的。冷战结束以来，美军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基于信息系统的作战体系不断强化，作战能力显著提高。海湾战争，多国部队与伊拉克军队的兵力对比为69万比120万，然而，美军凭借信息技术的优势，把多国部队30多个国家的作战力量组合成一个整体。这个天、空、地、海一体的体系，集侦察、指挥、干扰和攻击为一体，每一个单元都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一个“预制件”，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形成一种新的力量，整体作战效能显著提高。多国部队先后出动飞机十多万架次，只损失40架，被伊拉克防空武器系统击落的飞机不到出动飞机总数的3%，就是得益于基于信息系统的作战体系的高效能。伊拉克战争，美英联军实现了在传感器、作战平台和指挥中心之间实时传递目标信息，战场情况随时都能看得见、听得清、打得准。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军C⁴ISR系统与武器系统结合更加紧密，美军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大为增强，信息传输能力和指挥控制能力显著提高。美军“国防信息系统”网的通信带宽比海湾战争时扩大了10倍，空中作战指挥中心数据交换能力提高了100倍。可见，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是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关键所在。

军队建设发展要敢于打破以诸军兵种作战平台为中心的结构模式，依托信息系统把作战力量集成为综合感知、实时指控、精确打击、全维防护、聚焦保障于一体的有机整体，使各系统在信息主导下协调一致地行动，最大限度地凝聚作战能量、有序释放作战能力。

先进技术是提升作战能力的坚实基础

信息化是现代作战体系建设的核心。加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作战体系建设，关键是要提高信息技术的含量。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提高了作战体系的效能。随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信息系统在提升军事能力中的强大功效日益显现。海湾战争，美军的作战指挥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手工作业。伊拉克战争，美军先后动用90多颗卫星，与预警机、侦察机、无人侦察机以及地面侦察装备联网，构成全天候、全时空的立体侦察监视体系，美军的指挥中枢直接与基层作战单元相通，中央司令部的指挥官可以近实时观察到战场态势，甚至能看到每辆坦克或每门火炮的位置，进行近实时指挥。美军完成从发现目标到定位、瞄准、攻击、评估战果这五大步骤，海湾战争需要100分钟，科索沃战争为40分钟，阿富汗战争为20分钟，伊拉克只需10分钟。

未来战争是信息化战争，基于信息系统的作战体系的效能更为突出。“9 11”事件发生后，美国追加了400亿美元的经费，主要用于提高空军和海军对突发事件的信息反应能力，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加快发展电子信息装备。英军总结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建立具有英军特色的信息系统，加强电子信息系统的目标捕获功能。俄罗斯在莫斯科地区建立了由18颗预警卫星、16部大型预警雷达和A—50空中预警机组成的空中侦察预警系统，并计划装备新型防空一体化指挥系统，在俄罗斯西部建立新的战略预警雷达中心。这些都是对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功能的优化。

军地互动是发展信息系统的重要途径

加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既能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综合实力，也有利于国家信息化建设从军事信息系统中获得更加深厚的发展需求的技术支撑。国防和军队发展需要耗费相应资源，同时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拉动作用。

美国当年推行“战略防御计划”，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激光技术、动能武器、航天技术、红外探测技术、高级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波音、罗克韦尔、贝尔、霍尼伟尔、IBM等技术力量雄厚的多家大公司积极参加投标；美国国防部同著名大学、政府研究机构、民间研究团体以及工业、企业部门建立联系，促进信息交流和技术成果转让，探索一切可能对武器装备发展产生影响的新技术、新概念，这促使许多尖端技术得到迅速发展。新形势下，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融合越来越深入，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推进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以重大工程牵引军民融合发展，这是创新国防科研机制、推进国家信息化建设中重大关键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从这个意义上看，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是全党全国和全军的共同责任，加强军地协调和互动，发挥军地双方的积极性，是加快信息系统建设的重要举措。当年我国原子弹研制成功，军队和军工部门全力以赴，国家有26个部委，20个省市自治区，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院校参加攻关，军民融合、互动发展的这些杰作，对新形势下军地互动发展信息技术具有重要启迪。

■军事札记／十论战略思维之五

强烈的问题意识

□金一南

为什么不但说问题意识，而且要说强烈的问题意识？

因为存在决定意识。有战略问题的存在，才有战略思维的存在。

还因为战略思维中不但包含问题意识，而且往往包含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认识问题就是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开始。

在英国的伍尔索普，有一棵被封为“圣树”的苹果树。据说当年牛顿就是倚坐在此树之下，望着从树上坠落的苹果，悟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今天穿流不息的参观者到此，望着这棵长期无人修剪、枝桠及地的“圣树”以及树旁带有皇室标记的铜质徽章，想象当年牛顿双手叠在脑后，在冥想中完成物理学最伟大发现的情景，心中的虔诚与激动可想而知。

但这是一个错误。当人们把焦点集中在这棵枝叶繁多的苹果树上的时候，忘记了一点：伟大发现的地点并不简单等于这一发现的原因。当年牛顿思维的焦点和起点，是那个至今早已了无踪迹的苹果——它为何从树上坠落——这才是引起伟大发现的问题所在，而非牛顿坐的地方或那棵苹果树有什么非凡的灵光。

从这个意义上说，牛顿的问题意识的确强烈。在此之前，苹果悄无声息地不知坠落了多少年，没有任何人将其看作是问题。唯有牛顿把它当作问题，物理学上最伟大的发现——人类第一次找到宇宙和谐运行规则——由此开始。

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对疑惑或难以解决的实践及理论问题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由此驱使人们积极思维并不断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及状态。平时我们多见这样的现象：对问题视而不见或不屑于去发现，对概括成绩、挖掘优点和升华意义却兴致盎然、颇富创造力。这其中丧失的不仅是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精神和心理，更是积极提出问题、主动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实际能力。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们有很多分析都认为这场战争喻示着信息化作战正式登场、是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历史转折点、对世界军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如此等等。美军的概括却与我们不同。他们认为遇到了“理想的敌人” 获得了“理想的联盟”，拥有“理想的设施”和“理想的地形” 因而在“理想的战场”上打了一场“理想的战争” 之所以提出这么多个“理想” 无非是想说明如此理想条件今后很难再现，因而这场战争的指导意义十分有限。五角大楼的三卷本《海湾战争——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对战场成功和军事优势的描述基本上是轻描淡写，随便带过。依照我们一些人的思维习惯肯定认为成绩挖掘不深、优点概括不精，意义升华不高。但说到问题与毛病，他们却挖掘很深、概括很精、升华很高：“事实证明，美国地面和海上部队在扫雷经验、训练和装备方面都没有做好准备，这一点令人遗憾；战场通信能力严重不足，使那些距离稍微拉开、彼此喊话刚刚听不见的部队之间无法进行通话联系；提供的战术情报经常是马后炮，而且不能令人满意或者毫无价值；由于缺乏夜视器材，海军陆战队每天天黑后不得不停止作战行动。 看到这些评价人们不由得产生疑问：这还是那支被描述为全新高技术装备、全新高技术作战理念、无所不能的军队吗？该报告对问题的追究就是这样不依不饶：“我们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缺乏运输工具，不得不在全世界范围内到处租借卡车”；“事实上有些系统性能不佳，在作战中妨碍了部队的调动” “情报支援的不足也会越来越严重地妨碍武器效能的发挥”；“目前使用的压制敌方防空武器的飞机均已陈旧，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有些型号的飞机甚至正在退出现役”。这样的总结，与我们的众多描述和评价大相径庭。在战绩如此明显的情况下依然具有如此强烈的问题意识，对寻找缺憾如此敏锐，对查找问题如此锲而不舍，恰恰表明他们在力图保持清醒，在力求未来胜利。而今天人们说战略问题泛化、战略思维问题泛化，最大特征就是在花样翻新的词汇概念掩盖下，问题意识的极度欠缺。而战略思维最鲜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发现问题以及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思维指向。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什么？问题怎样产生？问题如何解决？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思维才会摒弃漫无边际和繁琐枝蔓，变得清晰简捷、单刀直入。

解放战争第二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打到外线。在快速发展的形势中，中共中央适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振奋党心军心的口号。但毛泽东没有被这一口号陶醉。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毛泽东与师哲散步时说：“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胜利，敢不敢胜利。 师哲十分不解，认为全党都对能不能胜利没有异议了，毛泽东为什么认为“敢不敢胜利”是个问题。毛泽东阐述说：“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游击，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敢不敢打正规战、攻坚战？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这么多的人口，要吃、要穿，面临着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责任来？

在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毛泽东的设问十分尖锐，也极其冷峻。每一个疑点的提出，每一个“敢不敢”的问题，都在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口号提供细致严密的注脚。这就是中国革命即将发生伟大战略转折的历史性关头，毛泽东作为这一革命的领袖，表现出的超强问题意识。他不仅看到了胜利的前景，更看到了真正实现这一前景必须克服的能力障碍和心理障碍、必须完成的能力准备和精神准备。这一系列“敢不敢”问题的提出，实际渗透着数十年武装割据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建立农村根据地到占领中心城市、从农村包围城市到最后夺取城市、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到正规战、攻坚战这样一种中国革命必然要完成的巨大转换。虽然我们说问题思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战略思维，但战略思维一定包含着对问题——尤其那些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思维。就战略思维层面看，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强烈的进取求胜意识相一致。与此相反，强烈的粉饰意识则与强烈的安于现状意识相一致。脱离了对问题的关注，就脱离了对未知的探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概括总结意识、提炼拔高意识、归纳升华意识不论怎样使文章和口号妙笔生花，也无法与尖锐冷峻的问题意识比肩。因为没有后者，不可能具有对未来的真正主导。

今天我们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时刻。在巨大的成就面前，强烈的问题意识变得尤其难能可贵。这里引用胡锦涛主席的两段话结束本篇。

一段话是：要深入研究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深入研究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带来的重大问题。

另一段话是：在新形势下，必须把研究重大战略问题摆在更加重要位置，不仅要形成浓厚的战略研究的氛围，还要逐步形成经常化、制度化的战略研究机制。